奈达翻译理论评述

熊德米
(西南政法大学外语系,重庆 400031)

摘要:我国翻译界长期以来信奉和遵循"信、达、雅"。改革开放引进了国外翻译理论界不少翻译理论和标准,其中最为国人称道的就是当代声名显赫的美国翻译理论之父尤金·奈达所提出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翻译信息论"、"读者反映论"等翻译理论和原则。这些原则和理论不仅丰富了我国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本文介绍和评述了奈达的上述理论。

关键词:信、达、雅;动态对等;功能对等;翻译信息论;读者反映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1)04-0085-05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Eugene A. Nida

XIONG De-m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In China, both translators and translational theorists have been abiding by the triplet theory of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Nevertheless, with the polici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al theo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mong which are "dynamic equivalenc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message theory", as well as "reader's response" advocated by Eugene Nida, father of translational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afore-mentioned theories have, on the one hand, enriched the translational theories in China and served as effective guide to the practical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accordingly,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Eugene A. Nida's theory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 dynamic equivalenc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message theory; reader's response

当今世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显著特点就是将翻译理论问题融入语言学的各门研究领域,即把翻译理论与当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比较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模糊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符号学以及美学、逻辑学、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学等边缘学科相结合,试图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找出翻译理论的新路子,探索新的翻译理论模式和实践方法。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卡特福德(J.C. Catford)和乔治·斯坦纳(George Stainer)等就是在上述有关领域卓有成效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是其中最为中国翻译理论学术界所熟悉且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

奈达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也是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被誉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其翻译理论在全球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最早、最多、影响最大。他的著名翻译论著《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1969,与塔伯合著)、《语义的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奈达论文集》(Language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by Eugene A Nida, ed. by Anwar. S. Dil)、《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on 1986,与冉·备·瓦尔德合著)、《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Bible Translating: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1947)、《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 1969)以及与中国学者金隄合著的《论翻译》(O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nd English 1984),和1993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The Socialinguistics of the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1996)等著作(包括合著)近40部,文章200多篇。

奈达的论著自从传入中国译学理论界之后,为中国翻译学术界打开了新的窗口,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译学内容

收稿日期:2001-06-25
作者简介:熊德米(1958-),男,重庆万州人,西南政法大学外语系法律经贸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硕士,主要从事英语翻译教学与理论研究。

"应该说,尤金·奈达这个名字在我国翻译界乃至语言学界,现已广为人知,因为,他的翻译理论是我国学术门户对外开放后被较早引进的当代外国人的翻译、他的理论译观也是国内译界评价较多的。"[1]

一

奈达1914年出生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荷马城,从小笃信基督教,并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中学开始学习拉丁语,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以后又专修外语,主攻希腊语,兼学拉丁语、德语和法语。1936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洛杉矶加州大学。1939年获加利福尼亚希腊语《圣经·新约》的硕士学位。1941年他进入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描写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古英语等课程,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dfield)等。1943年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奈达受雇于美国圣经公会,不久又受聘作该公司语言专家,并任《圣经》翻译部执行秘书、专门研究圣经的翻译及其理论研究。1946年任职于联合圣经公会组建的"《圣经》翻译工作小组",后来(1949)担任联合圣经公会创办的《圣经翻译》杂志(The Bible Translator)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一。在组织翻译《圣经》期间,他亲自担任翻译工作,组织大型研讨会议,制定培养出大量的翻译顾问人才。他所制定的《圣经》翻译原则和指导思想不仅用在《圣经》翻译和推广上,而且还广泛应用到其他翻译领域。

奈达发表的著作横跨45年,对他所遇到的大量翻译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奈达最知名的著作,无疑当推集20年研究成果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翻译过程三个阶段的模式:即分析、转换和重组。他还详尽地论述了自己提出的与形式对等相对立的"动态对等"概念,从而与那些把翻译仅看作是从表层结构中寻找对应成分的比较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

奈达首先是一个钟情于《圣经》研究的学者和翻译者。虽然他倡导和组织翻译的《圣经·现代英语译本》(Today's English Bible)主要读者对象是好些不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但该书1996年出版后,立即受到广大包括以英语为本族语的读者的热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译本所采用的英语形式清爽明晰,可读性极强。同时,奈达所倡导的翻译理论"动态对等"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得到检验,为推广英语世界对《圣经》的解读和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

奈达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语言翻译理论家。纵观西方语言学界,无论古代、近代或现代,人们通常只从语言历史、语言关系、社会语言学、论语分析、句法转换等方面探求语言科学和发展规律。像奈达这样把语言学校系统地适用到翻译理论中并从中找出翻译转换规律的跨语言学和翻译的语言学家还很少见到,能把语言科学、翻译科学和翻译艺术与文化紧密结合的语言学家就更少见。

奈达作为语言学家,非常重视以实地考查的方法研究和检验语言;他几乎每年都要到国外实地考查,每次都达几个月或半年以上。他先后到近百个国家、对200多种语言、特别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岛上的一些小语种进行研究。奈达在研究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同时,还参加语言学讲习所,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1986年,奈达还担任过一届美国语言学会会长。奈达对中国人民有着浓厚的情谊,从1982年起先后多次来华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其翻译理论著作《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1993)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该书在我国翻译理论界受到普遍好评,成为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首选研读的翻译理论著作。

二

人们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

描写语言学阶段的研究只是语言的句法现象和词法现象。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英语句法概要》(A Synopsis of English Syntax),《从圣经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论词法:词的描写性剖析》(Morphology: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Words: An Analysis of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1947),《翻译最常见的错误》(The Most Common Errors in Translating),《是翻译还是释义?》(Translate or Paraphrase?),《第二语言学习中的几个心理学问题》(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等。在第一阶段40—5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奈达主要从语言的词法、句法并结合翻译理论阐述语言的本质和语际翻译关系,试图找出更加科学的语言翻译转换规律。他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语言层次理论要比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要早得多。

交际理论阶段,这一阶段是他的翻译理论形成和确立时期,也是奈达关于译学科学理论研究生涯中"最重要、最活跃、最丰产的时期"。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为10年(1959—1969)。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的文章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的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著作是他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在这一阶段,奈达的语言翻译理论研究达到了高峰,他的系统翻译理论——翻译交际学理论在此阶段形成,尤其是他在这一期间所出版的专著《翻译科学探索》和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他在语言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崇高地位。在《翻译科学探索》中,奈达论及古代、近代许多翻译观点(如泰勒的"翻译三原则")、西方翻译发展史、译文信息接受者和原文信息接受的效果、翻译的定义原则、类别、方法、技巧、工作程序、组织问题以及机器翻译对等,在《翻译科学探索》中,作者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地阐述了翻译问题。他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艺术、一种技巧、一种文学的再创作、而且还是一门科学。……自始至终,奈

达就是从这种科学的观点出发，以现代语言理论为指南，采用描写性而非规范性方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2](P60)奈达第二阶段除上述经典性著作外，还有《圣经信息和传教使命》(Message and Missio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Christian Faith 1960)、《语义结构与翻译对等的几个问题》(Some Problems of Semantic Structure and Translational Equivalence 1960)、《圣经翻译与语言科学》(Bible Translating and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1963)、《语言与语义结构》(Linguistics and Semantic Structure 1964)和《翻译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on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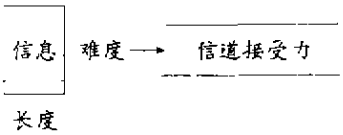
社会符号学阶段，从70年代到现在，年逾古稀的奈达翻译理论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奈达继续他曾经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翻译原则，另一方面又对以前的翻译理论进行修改和完善。将原来有用的成份纳入新阶段的研究之中，形成新的语言研究模式——社会符号学。在第三阶段，奈达主要研究语义问题。其观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语义关系问题。如果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义交际中的翻译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本阶段奈达最为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问题，这在第三个研究阶段显得特别突出。"尽管文化问题一直是奈达翻译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但在这一时期，他更多地注意到了语际交际中的文化因素问题，并开始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翻译问题。"[2](P61)他还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符号现象，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不能脱离语言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语言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原语(source language)在译语(target language)中忠实地表现出来，让译文读者象原文读者一种感受到原文的种种义蕴。在这一时期，表现其主要观点的著作和论文有《语义的成分分析》(Exploring Analysis of Meaning)、《语义结构探索》(Exploring Semantic Structure)、《符号，意义和翻译》(Signs, Sense and Translation)、《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 A Socia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意译》(Translating Meaning)、《论翻译》(On Translation)、《语际交流中的社会语言学》(The Socia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和《论翻译的社会语言学理论》(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 A Socia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以及《跨文化的意义传递》(Meaning Across Cultures)等。

三

奈达的翻译科学思想和应用语言学思想在翻译中的综合应用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也铸就了这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家，使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两千年来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哲罗姆到中世纪欧洲的波伊提、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伊拉斯莫、德国的路德、法国的多雷、英国的查普曼、到近代的巴托、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和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一直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人类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全，从而丰富并拓展了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3](P50)为人类语言的翻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树立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丰碑。纵观奈达语言和翻译学理论发展轨道，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界对奈达的研究成果，兹简述如下：

第一、翻译信息论(message of translation)

奈达首先将信息通讯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也是近年来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研究翻译问题。如卡特福德(C. Catford)、纽马克(P. Newmark)、雅可布逊(R. Jakobson)以及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科夫萨罗夫等。奈达和塔伯1969年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两部著作均对翻译信息论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2]翻译即交际，某种译文如果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即严复所讲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因此，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2](P12)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必须"拉长"信息的表达形式，让原文信息与译文读者的信息道相适应，即让原文信息顺利通向译文读者。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系的原语和译语。"这种拉长信息表达形式时，译者不能任意增加信息内容，而只是把原文那些'不言而喻'的内隐成分转变为文字。"[3](P119)就怎样"拉长"信息道，奈达还绘制图形：



关于这一图形的具体例证，奈达本人没有提供，可以引用张今教授所举的例子说明：Son, lover, thinker, fighter, leader, Hamlet is the incarnation of all human potential defeated by some warp of human nature and destiny. 译文：作为儿子、情人、思想家、战士、领袖，哈姆莱特是某些人本来可以享受天伦之乐、品尝爱情的甜蜜、在事业上作一番成就，但由于人性和命运的作弄，终于含恨而死的象征。英语词"potential"在英汉词典上译为"潜力，可能性"，实际上指"that which is possible"，含义很广；"human potential"指"人所能达到的一切"。联系 son, lover, thinker, fighter, leader 等词，"all human potential"的含义就更加广泛；defeat 指"挫折"。我们只能根据全剧剧情，从天伦、爱情、事业三个角度具体阐释，得出了上面的译文。总之，原文信息"all human-potential"一语的难度大而长度短，如果直译，不适合中国读者的信道接收力，因此，采用意译把信

息的表达形式拉长,按照奈达的说法,这是将原文的内隐或分转变成文字。

第二,"动态对等"论(dynamic equivalence)。

奈达在60—70年代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和(dynamic equivalence),80年代对此概念进行修正,改称"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对等"只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优于形式上的一致,有失偏颇,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内容和形式矛盾。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将原来的"动态对等"改成两者兼顾的"功能对等",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也要求对等"(not only the equivalent content of message, but, in so far as possible equivalent of the form),相比之下,"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

关于"功能对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又提出翻译对等二层次。他强调,所谓"对等"分为"最高层次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和"最低层次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最高层次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The readers of a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it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readers did.)而这种层次的译文,奈达认为永远无法达到,尤其是两种语言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差异较大时,更不可能达到。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The readers of a translated text should be able to comprehend it to the point that they can conceive of how the original readers of the text must hav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it.)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低于这一要求的译文就不可能让人接受。"(Anything less than this degree of equivalence should be unacceptable.)[4]

奈达在和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对翻译的定义:"所谓翻译,即是在人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 in terms of style.)这三个重要概念:最贴近(the closest)、自然(natural)和对等(equivalent),表明他对翻译的观念和态度。他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的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进行交际,并不存在某一种语言"先进",某一种语言"落后"而无法翻译的问题。但是,不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还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肯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绝对等值。不同语音、语法、词语等表达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相同的表达功能,译者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种差异,在意义和文体上找出最佳对等语言关系(意义和形式关系),使译文最大限度地从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原文。

第三,读者反应论(theory of readers' response)。

评价译文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译文读者通过阅读译文后对原文作者所示信息的反应。奈达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或译文语言接受者,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者的反应是否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验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对某种产品,不管理论上认为它多好,也不管它陈列时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反应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所以,"译文接受者与信息的关系应该是在实质上相同于原文接受者与信息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eptor and message should be absolutely the same as that which existed between the original receptor and the message.)[4]

评价一种译文的优劣,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研究,如词汇、句法、修辞以及文化等方面在两种语言中的表现形式,而忽视了译文的服务对象——读者对译文的具体反应。奈达注意到,评价译文必须结合译文读者的具体反应。怎样才能了解到译文读者反应与原文读者反应相同,从理论上值得借鉴和效仿,但从译文和原读者群体分,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教育层次均不同,要客观真实比较很难。事实上,"读者反应论"这一概念并非奈达一人独创,17世纪英国文坛巨星德莱顿早就创造出来了,只是被奈达进一步发展了。

第四,语言共性论(language universality)。

语言共性论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不同语言符号之间存在可转换性——可译性。两种语言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在意义上相通。只是需通过翻译改变原文内容的表达形式而已。奈达对这一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帮助创造了一种以新的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以增进人类相互之间的交流和了解。"[1]奈达坚持认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找到彼此对等的表达词语来进行交际。绝不存在某种语言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那种民族语言"落后"因素而在翻译中受到限制。他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写道:"如果说一切语言在形式上都有所不同的话(而语言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形式),那么,为了保持内容,自然就必须改变其形式。(If all language differ in form and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ir being different), then quite naturally the forms must be changed if one is to present the content.)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相同的思想内容,即"一种语言所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Nida & Taber, 1969)[2](P74)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共性多于差异,在人类经验和表达方式中,都存在一种"共核"(common core),世界上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即都能满足使用该语言的本族人表达思想、描述世界、进行语言交际的需要。关于"语言共性论"这一基本观点以及他本人的相关论述,在《翻译科学探索》中,他举出了大量语言事实说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如何翻译"white as now"(雪白)这一英语成语。他写道,如果世界上

有的地方一年到头根本就不下雪，那里的人们也无从见到天上所下的雪是什么东西，语言中也没有"雪"这个概念和相应的词汇，如果按照直译，对那里的人则不会引起相同的联想，因而这种译文也就毫无用处，从而形成他所讲的"零信息"(zero message)。在这种情况下，奈达提出了解决办法：如果译语中没有相应的词语或表达方式，可以将"as white as snow"译成"白如""霜"(white as frost)或者"白如白鹭毛、白如蘑菇"等相应的惯用法。这样的翻译，尽管在译语中有所"走样"，但其引伸义或比喻义仍相同或相似；如果译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法或惯用语，译者可以考虑用译文读者可以接受又能表达相近意义的词，如可以将"white as snow"译"非常白"或"很白"。又如，在古代西方，人们习惯于见面时用"神圣地亲吻"，而译成现代语则可以是"非常亲热地握手"；因而英语里的"spring up like mushrooms"译成汉语时，完全可以译成汉语读者所熟悉的"如雨后春笋"。

当然，对于奈达的上述观点也有不同反应，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持赞同观点的人认为，奈达的翻译方法可以解决许多难以翻译的难题，并以此来批驳那些持"不可译性"观点的人；而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奈达的翻译变通可能导致滥译或错译。

四

翻译作为语际交流的桥梁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非常古老的社会，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包括使用相同语言方言)之间的交流，就会有翻译的存在，有的翻译是自觉行为，而有的翻译则是不自觉行为。然而，尽管翻译实践早就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共同进步，但构建翻译理论系统却显得步履蹒跚。在西方世界，直到16世纪法国的多雷(Dolet)发表过翻译论文之外，在法兰西学院和詹森主义的共同影响下，人们才开始认真探索翻译理论，按照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系统研究翻译活动。可惜这些努力被当时处于黄金时代的法国文学所窒息了，直到1660年力斯帕尔·德·唐德(Gaspard de Tende)的《翻译的标准》和1661年皮埃尔·达尼埃尔·于埃(Pierre-Danniel Huet)发表的《论翻译》，打破了公元前的西塞罗(M. Cicero, 106-43, B.C)之后历代译家的传统做法；从18世纪末的施莱尔马克赫(F. E. D.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到本世纪的奈达穆南(G. Mounin)和卡特福德(J. Catford)长达二千多年的西方翻译历史，人们吸取哲学、宗教、语言学、美学精华，形成独特而具有开拓性的翻译理论体体系。"然而，由于翻译受到相关学科学者们的冷落，从而使它没有能够被看作是一种 sui generis(自成一体的)活动。"又由于人们对"可释性"这一古老的问题，即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可译性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对翻译活动的悲观论调长期盛行，从而延缓了翻译理论的形成。"

自从60年代奈达"提出了一套以读者的反应为依据的翻译理论"之后，在西方翻译学理论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旗帜，一改过去翻译理论只注意原作在译文中的表现情况，只注意译文与原文表现对等的翻译观念。他认为，所有表面的文字现象(符号)不重要，译者可以在用字、修辞、比喻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上作一些灵活处理；根本问题在于，这些改动与调整能让译文发挥原文在读者中所起的作用。即今天的译文读者作出的反应应跟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所产生的反应基本相同；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译者就应该对译文的种种表达方式进行修改，务必让译文作出类似于原文作者的反应。这是他所提出的"功能对等"反对"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的根本所在。反对"形式对等"，总之，"意义第一、形式第二"是奈达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关键所在。

纵观奈达的所有重要观点，其核心就是要译者不拘泥于原文语言的表面形式，而主要关注原文的意义。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奈达是一个"意译中心论者"，"意译是奈达翻译理论的核心"。[2]

奈达的翻译理论尽管在翻译理论界和实际翻译人员中起了不少的理论指导作用，但也引起不少争论。有人认为他的理论体系来自于《圣经》翻译，不适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翻译哲学、历史、科技等著作时，译者就应该如实地传达原文内容，而不能只顾读者的反应；他的"动态(功能)对等"所强调的间译方法在中国早有人提出，但毕竟是他的一家之言，难免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更何况他的理论观几乎涉及了语言翻译的方方面面。不可能不会带来相反的观点和看法。再说，一个理论的提出，如果没有人敢于提出质疑或表示不同观点，这种理论也就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翻译理论也不例外。可见，奈达的理论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翻译世界，尤其是中国翻译理论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只要有翻译理论研究的地方，就会有人通过各种形式了解、引用奈达的翻译理论。一言以蔽之，"奈达给翻译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3]

参考文献：

[1]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谭载喜．外国翻译理论评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4]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1964. Preface.